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14冊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上）

黃雅淳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上)/黃雅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6+18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14 冊)

ISBN：978-986-322-024-4 (精裝)

1. 魏晉南北朝哲學 2. 知識分子

030.8

101015380

ISBN-978-986-322-024-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322-024-4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 (上)

作 者 黃雅淳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 (精裝) 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上）

黃雅淳 著

作者簡介

黃雅淳，臺灣台中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曾任弘光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系主任兼副教授，講授中國奇幻文學、兒童文學與文化產業等課程。主持多項文化創意、人文藝術、兒童文化產業、地方文化產業創新等計畫，並發表多篇相關論文，著有《人文精神》（合著）、《中國歷代寓言》（合著）等書。

提 要

中國文化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多年來，士人在歷史文化中擔負著知識傳播與文化思想承傳的使命，故當他們面對生死、名利、出處等重大人生問題時，有比眾生更深的思考與表達。他們的言行為社會上的群眾提供處世的方式與準則，在精神及思想上影響民族的思考方式、心理反應及性格氣質，以及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故若能了解士人處世的心態、人格的追求與生命意識的內涵，便是開啟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鑰匙。

而在中國漫長的文化史上，魏晉士人的生命意志與人生歷練是最令人心折動容的。他們處在混亂無序的歷史黑暗中，戰亂不絕，政權更迭頻繁，禮教的鬆弛變質，使文士們「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抱負與推行教化的文化使命感皆無從實現，艱難的生存境況，亦使其個性與人格受到嚴重的壓抑扭曲，不論入仕或隱居，均在不同的處境與程度上，受到心靈或形體上的打擊。故內心多是矛盾、痛苦而充滿悲情。

本論文試著以魏晉士人的悲情意識作為切入點，從天道觀及儒家思想分析其悲情意識形成的文化淵源及外緣內因，探求其悲情意識的基調與呈現方式；其中以重要詩人曹植、阮籍、嵇康、陶淵明作為論述的重點，因此四位詩人的生命情調呈現了魏晉士人對待現實人生的變化過程。他們苦苦掙扎於其間，或逍遙遊仙，放浪山水，或寄情縱酒，托意詩文以力圖超越，構成魏晉時期文化的獨特風采。透過魏晉士人之詩文以探求他們的精神人格和身處其間所呈現的悲情意識，以及力求解脫的途徑，對於今日身在兩岸三地的歷史轉折處的中國知識份子，當能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省思與力量！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悲情意識的研究意義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一、魏晉文化學的闡釋	4
二、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6
第二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文化淵源（上）	13
第一節 天道觀與悲情意識	14
一、生命悲情	17
（一）惜時傷逝	17
（二）憂生畏死	20
二、自然悲情	24
（一）悲秋主題	24
（二）傷春主題	28
三、歷史之悲	30
（一）亡國之哀	30
（二）盛世之憂	32
第二節 儒家思想與悲情意識	34
一、君棄之怨	36
二、思鄉之愁	39
第三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文化淵源（下） —	
一 屈原與悲情意識	43
第一節 屈原與「士」人格的建立	43
第二節 屈原「忠奸之爭」的政治悲情	49
第三節 屈原悲情意識的呈現方式	52
一、美人不得之苦	53
二、爲君所棄之怨	55
三、歸鄉不能之哀	57
第四節 屈原悲情意識的文化意義	60
第五節 魏晉士人對屈原的解讀及其意義	64
一、視屈原爲「以才立身」之士人代表	64
二、引屈原之「任情率性」「狷介直行」爲同調	66

第四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形成之內緣外因	69
第一節 天下多故——政治因素	70
一、政治環境	70
(一) 英主絕少	71
(二) 政風敗壞	72
(三) 屠殺成風	77
二、戰亂相尋	82
(一) 漢魏之際——群雄征戰	82
(二) 魏晉之際——奪權之爭	85
(三) 晉宋之際——內外交戰	86
第二節 人倫衰朽——社會因素	89
一、天災人禍頻仍	90
(一) 災疫流行	90
(二) 民生凋敝	94
二、政教中心破壞	95
三、禮法變質敗壞	97
(一) 競尚奢靡	98
(二) 淫佚荒誕	101
(三) 名教淪落	102
第三節 人心思變——學術因素	104
一、儒學變質	105
二、人性覺醒	109
(一) 思想的新舊衝突	110
(二) 文士心靈的重負	112
三、玄風揚起	115
(一) 玄學的興起	115
(二) 玄學的發展	117
(三) 自然與名教的衝突	119
第五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基調	141
第一節 悲情意識表現的主題	141
一、與天地獨往來	141
(一) 人生的自我觀照	142
(二) 人生無常的孤哀	147
二、易代亂世之憂	154
(一) 身處險世之憂懼	154

(二) 亡國入仕的孤苦	158
(三) 念亂憂生之悲憤	161
(四) 動盪歲月的飄零	164
第二節 悲情意識表現的意象	170
一、飛鳥失群，罹網之懼	170
二、孤臣棄婦，幽怨傷別	178
三、遊子遷流，思鄉念故	183
下 冊	
第六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一）	
——曹植的飄泊轉蓬	189
第一節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	
——曹植一生的悲劇	190
第二節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	
——曹植悲情的形成	197
一、思想性情與曹氏集團的政風不合	197
二、與曹丕的爭立太子	201
第三節 曹植的政治抱負與人格追求	203
一、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	
——曹植的政治抱負	203
二、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曹植的人格追求	204
第七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二）	
——嵇康的幽憤孤哀	209
第一節 家世與精神追求	209
一、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嵇康的身世	209
二、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的精神追求	213
第二節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的性格	218
第三節 嵇康的幽憤孤哀	222
一、輾轉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理想與現實的割裂	222
(一) 自然與名教的執著對立	222
(二) 人間與仙境的雙雙失落	225
二、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	
——情感與理智的衝突	228

第四節	玄學人生觀的悲情本質	232
第八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三）	
——	阮籍的苦悶沈憂	237
第一節	家世與思想追求	237
一、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	
——	阮籍的家世	237
二、	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並流	
——	阮籍的思想追求	240
第二節	「至性過人，與物無傷」的壓抑性格	242
第三節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	《詠懷》中的苦悶沈憂	246
一、	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	曹魏敗亡的感慨	248
二、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	
——	易代之際的憂憤	255
三、	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	
——	身與願違的掙扎	262
第四節	嵇、阮共同的悲情	267
第九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形態（四）	
——	陶潛之遠累避禍	271
第一節	陶潛的平生境遇與人生態度	272
一、	少時壯且厲，委懷在琴書——少壯時期	272
二、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遊宦時期	274
三、	守拙歸園田，叩門拙言辭——歸隱時期	276
第二節	陶潛之悲情	280
一、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一心處兩端）	
——	仕與隱的掙扎	281
二、	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	
——	貧困煎熬與時運相逼	286
三、	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	易代之際的人事感傷	291
第十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消解	301
第一節	遺物棄鄙累，逍遙游太和——遊仙	301
一、	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曹植	304
二、	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縱——嵇康、	
阮籍		308

三、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郭璞	312
第二節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田園山水	317
一、自然山水意識的覺醒	319
二、隱逸與山水田園合流	324
（一）西晉以前，以隱避禍	326
（二）西晉之隱，俯仰山水	327
（三）東晉之隱，悠遊吟詠	330
三、山水清音的怡情解憂	331
第三節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縱酒	337
一、建安之醉，以樂解憂	337
二、竹林之飲，以醉避禍	339
三、陶潛之酣，詩酒自娛	343
第四節 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文藝	346
一、「發憤以抒情」的理論緣起	347
二、「長歌當哭」至「蚌病成珠」	350
三、音樂的怡志養神之效	353
第十一章 結 論	357
第一節 悲情意識的正面價值	358
一、困境中的反思覺醒	358
二、生命意識的選擇	360
第二節 探索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時代意義	361
附 錄	365
附錄一：魏晉大事年表及學術年表	365
附錄二：魏晉士人生卒年及卒因簡表	368
主要參考書目	373
後 記	389
附 表	
附表一：魏晉時期昏君一覽表	71
附表二：魏晉時期大屠殺簡表	77
附表三：東晉北伐表	87
附表四：漢末至兩晉災疫簡表	90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古代，自春秋末戰國以後，所謂「士」者，即今稱之為「知識份子」。古代士階層的興起，在孔子開講學風氣之後。孔子於春秋末開講學之風，傳播《易》、《詩》、《書》、《禮》、《樂》等殷周以來的古代文化典籍，又因魯史而修《春秋》，廣收弟子，有教無類，於是官守之學散於私家，至戰國時，百家爭鳴，士階層因而興起，戰國諸子都是所謂「士」。二千多年來，士人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傑出者，常能輔佐君主，治國安民，成為良相；而當國家民族遭受危難之時，有志之士常挺身而出，保衛國族，誓死不屈；若朝政腐敗之時，士人則起而伸張正義，針砭弊政，以澄清天下為己任。至於在文化上承先啟後，在宗教、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各方面之卓越貢獻，則更是無待詳說。

但是，在對古代知識份子的研討中，學者們更多關注的是他們的思想、學說、著作、經歷與政績，而較少對他們的心靈感受、處世心態作探討。這無疑是歷史文化中的一段空白，因為歷史文化從某種意義而言，可說是人類的心靈史。人，是文化的創造者、體現者、承啟者。在世世代代的文化長流中，一些文化使人性更加完善，一些文化使人心異化變質。人在各種文化的衝擊下，省思或呈現出與之對應的人生態度和生命意識，而透過文學形式折射出來。因此，文學亦是人學，古往今來的文學創作無不是通過作者的情態意識去呈現。故欲深刻地了解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就必須對文化與文學的

主體——人，其豐富而真實的心靈世界去探尋。

現代心理學認為人有本我、自我與超我等不同的心理層次，故人的行為和心理往往無法一致。於是，以文論人，或以人論文並不能真正了解士人的生命底蘊。而這其中文格與人格不能相應的現象，往往是士人處世時內心矛盾的呈現。士人在歷史文化中擔負著知識傳播與文化思想承傳的使命，故當他們面對生死、名利、出處等重大人生問題時，有比眾生更深的思考與表達。他們的言行爲社會上的群眾提供處世的方式與準則，在精神及思想上影響民族的思考方式、心理反應及性格氣質，以及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故若能了解士人處世的心態、人格的追求與生命意識的內涵，便是開啓中國古典文學深層結構的鑰匙。

而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是，儘管二千多年來中國優秀的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有如此重要的貢獻，可是他們的生活命運卻常是坎坷悲涼的，心靈也常充滿沈憂積憤，這其中的原因何在？他們發抒在文學作品中的悲傷苦痛，其背後有著怎樣曲折隱微的心理煎熬？而他們又是如何面對現實人生的挫折？如何調適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而面對所處的時代，又是抱持怎樣的應世態度？因此，本論文試著以中國知識份子的悲情作爲一個切入點，以了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這道伏流。但是每個朝代的知識份子有著不同的悲情成因與內容，故筆者先以斷代的探究作爲起步。而在中國漫長的文化史上，魏晉士人的生命意志與人生歷練是最令人心折動容的。他們處在混亂無序的歷史黑暗中，戰亂不絕，政權更迭頻繁，禮教的鬆弛變質，使他們處世艱難，不論入仕或隱居，均在不同的處境與程度上，受到心靈或形體上的打擊，因此造成他們在錯綜的現實環境中產生種種複雜的心情，而這些心情往往透過詩文隱微曲折地表現出來。

時代的命運，使這時期的士人有著普遍的悲情意識。在古代，一個真正受傳統儒教薰陶的士人，其內心不僅有高卓的志向追求，對美好的事物，也有異常的敏感與執著，因此待人處世往往十分理想化。這樣的性格，一旦涉足官場，即難免陷入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不僅對政治中無處不在的權力角逐、明爭暗鬥難以忍受，內心也爲自己身在政治黑暗之中而掙扎苦痛。再加上名士性格的文人露才揚己，易招嫉妒，又總是不善應付政治中的權力鬥爭，對外來的迫害，更無力自保，故魏晉時期之士人多死於非命。（註1）尤其是從

〔註1〕大陸學者景蜀慧在《魏晉士人與政治》，頁7中，根據魏晉時（包括建安時期）

漢末到晉宋的二百年間，政治上發生了漢魏、魏晉和晉宋三次禪代，經歷了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多次巨變，政爭激烈、局勢險惡、危機四伏。黑暗的政治使文士們「以天下爲己任」的人生抱負與推行教化的文化使命感皆無從實現，艱難的生存境況，亦使其個性與人格受到嚴重的壓抑扭曲，故內心多是矛盾、痛苦而充滿悲情。因此魏晉時期士人的處境與心境，頗令人感慨與沈思，故探求他們的精神人格和身處其間所呈現的悲情意識，以及力求解脫的途徑，對於今日身在兩岸三地的歷史轉折處的中國知識份子，當能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省思與力量！

第二節 悲情意識的研究意義

悲情意識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與人的自我意識增強後，開始爲人們所自覺和思考。故悲情意識是對現實困境或悲哀際遇的一種反映，也是文化意識中的一部分。《詩經》的「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註2〕、曹植〈雜詩〉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閒」至魯迅說：「多傷感情調，乃知識份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註3〕等，均可知悲情意識於中華文化中的起萌甚早，影響甚深。此言悲示雅的背後是對人生的一種正視和追求，一種不甘庸碌無爲的覺醒，它具體呈現爲文學藝術。劉鶚在《老殘遊記·自序》〔註4〕中言：

《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相思向誰說？』曹之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比較著名且史書中記載生平較爲詳備的五十多位詩人的遭遇統計而簡列生卒年及卒因表，其中約有60%死於非命。而在史書中不見記載的死於某些間接、隱蔽的加害因素的士人，其數更多。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1年11月版。

〔註2〕《詩經·魏風·園有桃》。

〔註3〕見《魯迅書信集》〈致曹聚仁〉，張效民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註4〕見劉鶚著《老殘遊記》，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10月第4次印行。

可知文化中悲情意識的載體主要是文學藝術。然而現實的困境並不一定會隨之產生悲情意識。因人們在面臨現實的困境時，往往會以宗教或哲學的超越性來轉化或消解悲情，使人在困境中保持一種超然和寧靜。只有放下宗教的超然或哲學的理性把握，直接面對嚴酷殘忍的現實，感受對困境的無能為力，才有可能產生悲情意識。

作為知識份子，面對現實人生的困境，總希望能以一種理性的思維來分析化解。但人生的悲境卻常是理性把握不了的，它在時代和歷史的影響下，暴露出時代的難題。身處其間，的確難識其真面目，愈是想去理清思考，卻愈理不清問題所在時，悲情意識便產生了。而文學藝術以其既非理性哲學的邏輯所能窮盡，又非宗教信仰的寄托所能容括的特性，恰成為悲情意識的呈現方式。

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悲情意識與宗教滿足情感寄託及哲學解決人生困惑的功能一樣，對文化的省思和發展，均有其正面的意義和價值。因悲情意識既反映了現實的困境，使人們對現實產生懷疑與詢問，但回應此意識所產生的行動與思考，卻因而使人們對困境產生一種韌性的承受力，也因而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言「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所謂「鬱結」，即是陷入困境。而創作的完成，正是通過痛苦和恐懼的激發而達到情感的淨化與消解，如鍾嶸《詩品序》中言「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也。」也正是就悲情意識對困境的彌合及對文化的促進功能而言。保羅·韋納在《概念化史學》〔註5〕中言：

分析一種心態就是分析一種集體性，一種心態不僅是指眾多個人在想同樣的東西這一現象，在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身上，這種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樣的東西』這樣一種印記。

故本文對魏晉時期士人們普遍存在的悲情意識作探究，以有助於更深刻地了解中國文化的本質。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魏晉文化學的闡釋

魏晉美學乃至魏晉文化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所苦苦求索的一個中心問

〔註5〕見《新史學》，頁97，姚蒙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題。〔註6〕不同的學者往往試圖從不同的方面去契入魏晉文化的內在本質，力圖給予魏晉文化以新的闡釋。宗教的、歷史的、政治的、文學的、風俗的、藝術的、哲學的眼光共同構成了對魏晉文化的立體觀照。如魯迅從藥、酒入手，將文學與當時的社會風俗聯繫在一起，不僅從特殊層面上看到魏晉文化對士人人格精神的消極影響，而且從整體意義上把握了魏晉風度的狂狷特質。因此，魯迅特別重視嵇康在魏晉文化史上的特殊意義。〔註7〕從魯迅的描述中，我們不僅可以體味魏晉士人談玄論理，服藥飲酒，交游宴飲的風俗，而且可以體味魏晉士人爲逃避專制、反抗名教、抗拒俗世、追求高潔的人格精神所進行的內心掙扎。魯迅更注重後者的闡發，力圖給予混亂動蕩時代的中國人以心靈的啓示。湯用彤偏重佛禪玄理來闡發魏晉精神，陳寅恪則偏重於歷史來弘揚魏晉風度及其人格精神；馮友蘭、牟宗三則偏重於從哲學來解釋魏晉風度，對才性與玄理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作用予以充分重視。宗白華、方東美、李澤厚則偏重於從美學方面來體悟魏晉精神，他們所作的富有詩性的審美發揮把魏晉風度提升爲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人格精神和審美自由追

〔註6〕縱觀中國文化的發展，先秦文化是一種多元並存的格局，儒家偏重於仁和禮，道家偏重於道和游，墨家偏重於非樂，法家偏重權術政治，陰陽家偏重於術數神秘。其中，儒道二家是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精神的。魏晉文化思想雖以老莊哲學爲主導，但又容納了禪宗精神，與儒家的狂狷人格並不矛盾，且它對風神氣骨的追求、對情感的推重乃至對玄理的闡發完全不同於其後的宋明理學。魏晉偏重於道玄，而宋明偏重於義理，尤其在「群己關係」中，魏晉偏重於個體精神的關注，而宋明則偏重於群體德性的思考。宋明時的主導精神是儒家，而魏晉則以道家玄理爲本，以情感體驗爲據，使儒道融合在玄禪之思中。因此對魏晉文化的思考才顯得重要，因這是儒道思想分化的關鍵期。後來的論者大都從道玄游心的角度去解釋魏晉文化，把魏晉風度想像成個體情性的覺醒。事實上，魏晉士人在追求外在通脫的同時，內心卻背負著沈重的負擔。魏晉風度既不是生命抒情的極致，亦非無邊的黑暗與壓抑。魏晉士人從時代的黑暗壓抑中尋求個人放達之路是有其矛盾與掙扎的，因而，魏晉風度其實是中國士人不得已而選擇的一種生存態度。

〔註7〕魯迅對嵇康的賞愛，或許與他自己生命氣質與追求有關。魯迅一生的行跡追求的是抗爭與獨立，而他對嵇康的評價也著重在他性格上的獨立與抗爭。在魯迅看來，所謂「思想通脫」，便是「廢除固執」，「充分容納異端與外來思想」，爲了堅持思想的獨立性，甚至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非湯武而薄周孔」。又說「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舊說反對」。（見《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係》，《魯迅全集》第三卷，頁51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認爲嵇康的文章之所以「析理綿密」，與其「思想新穎」有關；之所以能「思想新穎」，與其不願依傍司馬氏更是不可分離，故他始終能保持一種獨立不羈的姿態。此應當也是魯迅對自我處亂世中身爲新時代知識份子的期許與堅持。

求。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羅宗強著《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李清筠《魏晉名士人格研究》、景蜀慧著《魏晉士人與政治》、高華平的《魏晉玄學人格美研究》、吳冠宏《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以「情」為綰合及詮釋路線》、蔡忠道《魏晉儒道互補之研究》、李玲珠《魏晉自然思潮之研究》等，加之眾多關於魏晉文化的學術論文，實質上已形成了魏晉文化研究的盛況。在如此廣泛的魏晉文化探索中，要想發掘出魏晉文化的新義，殊屬不易。

目前研究魏晉文化的兩個主要方法是：（一）從宏觀把握上梳理魏晉文化，給予宏觀的描述。此種方法雖也涉及具體的作家作品，但由於體系過於龐大，有時反而不能呈現個別作家在同一時代的限制下的不同文化思考，如吳功正的《六朝美學史》、李健中的《心哉美矣——漢魏六朝文心流變史》。（二）從具體的作家作品出發，重新建構其思想體系，使之獲得當代意義。如對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的文學或思想的闡釋，這種研究從具體入微處入手，有時並不能呈現整個時代的文化風貌。

而本文試以「悲情意識」為主題，從心理層面切入，透過對魏晉士人集體生命意識的分析與探討，乃是以小觀大，一方面期望呈現魏晉時期士人們在玄學思潮與自然思潮之下，隱微曲折的低吟；同時也希望能夠對目前文化失序的台灣社會以及現代知識份子處其間的安身立命之道，甚且是個人對待福禍相倚、悲欣交集的人生歷程，提供一些仰望的文化視野。

二、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本文研究魏晉士人的悲情意識所涉及的範疇甚廣，不同學門的綜合運用皆有所涉獵，如社會文化學、哲學、史學、美學、心理學……等，雖無法一一深入，但借助前人對魏晉文化的研究成果與結論，將能提供本文更寬廣的觀點。

在資料的援引上，是以魏晉詩文為主，兼及魏晉史籍、玄學資料，並參照近人的相關著作。中國的詩文受到傳統「詩言志」觀念的引導和「記言」、「記事」的歷史意識之影響，使它成為古代知識份子心理真實的寫照。且因為「發憤以抒情」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它有理論作為憑藉，故能使我們藉詩文來透視魏晉時期士人的悲情。而且彼時，由於內有政治鬥爭、軍閥篡亂，外有異族入侵，以致禁網嚴密。各個易代之際，黑幕重重，統治集團之行為，更是不可告人。史家秉筆直書，每每得禍，因此對當時政治中的許多隱秘，故用曲筆，對統治者的惡行，也常有迴護之處。這種加工過的歷史資料流傳

下來，固然有助於後人對歷史脈絡梗概的了解，但又有一定的意義上，妨礙了我們探悉歷史的某些真相。歷史的一些角落、斷面，確實是正史中看不到的。繆鉞先生在《治學補談》〔註8〕中言：

各種古書所記載的多是古人活動的表面事跡，至於古人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在史書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學作品中才能探尋出來。所以文學作品是心聲，一個歷史人物的文學作品是他一個人的心聲，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則是代表著這一個時代的心聲。

當代法國新史學派的主要人物勒高夫認為：

人們應當鉤勒、解釋歷史的空白和沈默之處，使歷史既建立在它所經歷而又表現出來的實處，又建立在它所經過卻沒有表現出來的空白處之上。〔註9〕

從知識份子的作品為出發點來深入了解社會歷史，所側重和期望的，正是中國古典詩文中潛在包含著正史中所不具備的歷史真相，甚至有時詩文比正史透露出更多的社會深層心態。文人透過其詩文表現出來的深層心態，不僅反映了個人對政治的抱負、人生理想、在現實中的哀樂悲歡等思想感情，也有助於我們去深刻時代的精神特徵。

換言之，透過詩文的感慨詠嘆和抒寫描述，參之以相應相關的文史資料，我們便能進入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世界。在此，哲學思想已不再是超然於生活現實之上的觀念體系，人格理想也不再是游離於現實情感和生活個性之外的抽象事物。詩文與社會政治現實和知識份子的人生實踐結合為一體，並且呈現出「兼濟」與「獨善」的人生理念相互制約下，所形成複雜多變的處世方式；因此，我們將發現，生與死的衝突，如何一方面被協調為生命智慧，而同時又化為士人的生活與藝術的美學觀；情緒與道德的自覺，人生的需求與人格的完善，曾經如何的整合與衝突，……。因此，對於詩文中心理的分析和心理現實的描述，或許比由哲學觀念所闡發的人格理想複雜而真實的多。因此本文對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研討，將以士人的詩文作品作為透視他們心靈世界的主要窗口。

在論述第二章〈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文化淵源〉上與第五章〈悲情意識呈現的基調〉時，乃採用主題式的探索。主題（Theme）本是西方文學理論中

〔註8〕載《文史哲》1983年第三期。

〔註9〕見《新史學》，頁37，姚蒙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